

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赵昕东 沈承放*

摘要: 本文首先按照时间顺序总结分析了国内外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进展与研究前沿。早期国外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到重视,21世纪初国外研究重点转向区分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对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相反表现。国内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早期研究主要是对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中国适用性的验证,随着对收入不平等关注的增强,学者们不仅仅关注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而且更加重视收入不平等的后果,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增长导致收入不平等转向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增长。2005年前后开始陆续出现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采用计量方法检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作用。进入21世纪,国内学者开始关注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异质性问题。其次,本文从影响机理、数据、方法和政策等角度对研究进展做了进一步总结。最后结合中国经济现实,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空间。

关键词: 收入不平等;经济增长;中等收入陷阱;分配政策

中图分类号: F061.2

一、引言

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8万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高达12000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①,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下一步的目标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表明,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绝非易事,很多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无法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只有亚洲的日本、韩国等少数国家和地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而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和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均已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目前这些国家仍缺少经济增长的动力,徘徊在人均GDP3000至12000美元的发展阶段而无法进一步提高(Gill et al., 2007)。大量研究表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收入差距巨大,收入不平等抑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

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把消除贫困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通过精准扶贫,努力帮助贫困

*赵昕东,华侨大学统计学院,邮政编码:362021,电子信箱:xzhao@hqu.edu.cn;沈承放,华侨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邮政编码:362021,电子信箱:20011020005@hqu.edu.cn。

本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发展阶段伟大实践与发展经济学理论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1&ZD071)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资助。感谢审稿人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地区的贫困人口脱贫,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是,我国收入差距在世界上仍处于较高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刻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在2008年达到峰值0.491后,近年来维持在0.46~0.47区间,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更是远远高于一般发达国家0.24~0.36的水平。我国的高低收入比也处于较高水平,2013—2020年高低收入比的均值为10.64。^①因此,当前我国较大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抑制经济增长。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Barro(2000)研究发现,高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域发展不平衡,收入水平处于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跨越的历史阶段,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而且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稳定性、储蓄习惯、消费习惯以及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都与其他国家不同。因此必须借鉴世界各国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当前收入差距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开展深入研究。

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总结已有的研究进展和研究前沿,进而结合中国经济现实,提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和研究空间。

二、研究进展

(一) 国外关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早期国外学者关注的是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Kuznets(1955)最早对此问题开展研究,指出产业从农业向工业转移过程中,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导致收入差距的产生。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必然付出的代价。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均资本的提高导致劳动生产率提升,中等收入阶层的回报提高。因此Kuznets提出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呈“倒U型”关系,他认为社会变革、市场结构调整和政府政策等多种因素促成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告诉我们,收入差距扩大在发展初期是不可避免的,但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趋势将会逆转。

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受到国外学者重视。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某些东南亚国家和南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由于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经济增长出现停滞,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一方面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竞争力下降,在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上竞争不过低收入国家,被低收入国家追赶;另一方面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其产业被发达国家压制,导致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经济停滞(Cai, 2012a, 2012b)。Gill等(2007)认为在低收入阶段,投资、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很容易改善,比较容易实现经济增长,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这些要素的边际产出递减,要素增长难以带来经济增长。

1990—2000年期间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验证收入差距在那些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所发挥的作用,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研究结果表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Alesina和Rodrik(1994)使用1960—1985年数据,研究发展收入和土地不平等与经济增长负相关,而且负相关关系不受政治体制影响。Alesina和Perotti(1996)使用71个国家和地区1960—1985年的数据,实证结果显示收入差距通过影响社会稳定,降低投资并阻碍经济增长。即使在模型中增加了反映国家异质性的虚拟变量,结论仍然成立。Persson和Tabellini(1994)使用发达国家和地区数据,用收入前20%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份额表示收入差距,研究发现收

^①数据来源:《任泽平谈中国收入分配报告2021:现状与国际比较》,新浪网,2021年9月17日(<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21-09-17/zl-iktzqyty16464966.shtml?cref=cj>)。

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Perotti(1993)使用67个国家和地区的样本,以中产阶级收入份额反映收入的平等程度,研究发现中产阶级收入份额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正向影响程度更大,显著性更强。Clarke(1992)使用81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Li和Zou(1998)使用46个国家和地区1960—1990年的面板数据得出相同结论。

21世纪初国外研究重点转向区分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在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相反表现。Barro(2000)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使用1960—1990年的数据,应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转折点,在人均GDP低于2070美元的国家,收入差距抑制经济增长;在人均GDP高于2070美元的国家,收入差距促进经济增长。Barro之后其他学者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即高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完全相反。Castelló(2010)使用56个国家和地区1960—200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对于全体样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负向关系,在高收入国家的影响为正向,低收入国家的影响为负向。Voitchovsky(2005)使用21个国家和地区1975—2010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基于全部样本的结果,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不显著;但是,在收入较高国家有正向影响,在收入较低国家有负向影响。Binatli(2012)按时间将样本分为1970—1985年和1985—2012年两个时期,发现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早期是负的,在后期是正的。Khalifa和El Hag(2010)使用1970—1999年70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应用门限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对于人均GDP低于1079美元的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显著为负;人均GDP在1079~1347美元之间的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仍然显著为负,但是,影响程度变小;对于人均GDP大于1347美元的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显著。Deininger和Squire(1998)使用66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得出收入差距在贫穷国家阻碍经济增长、在富裕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

这一时期也有个别研究得到与Barro相互矛盾的结果。一些研究发现无论在低收入国家还是在高收入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都呈正相关关系(Forbes,2000),而另一些研究发现无论在低收入国家还是在高收入国家都具有负相关关系(Wahiba and Weriemmi,2014),Neves等(2016)则得出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没有相关性的结论。

也有学者注意到时间滞后性问题,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有不同的路径,有些影响路径时滞很长,有些影响路径时滞很短。Desdoigts和Jaramillo(2020)认为通过教育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的时滞很长,通过消费影响经济增长几乎不存在时滞,区分长期和短期效应可能在估计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国内关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国内关于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早期研究主要围绕着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对中国适用性的验证展开。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对收入不平等关注的增强,学者们不仅仅关注收入不平等的原因,而且更加重视收入不平等的后果,研究重点从经济增长导致收入不平等转向收入不平等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学者们普遍认为收入不平等阻碍经济增长,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李实等(1998)认为尽管不平等是快速增长的产物,但同时又是影响进一步增长的重要变量,如果放任不平等的扩大,增长的好处将不能分配给大多数人,那么增长将不会成为一种长期持续的发展过程。朱新武和阮大伟(1999)指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能够导致居民消费倾向快速下降,引起总体居民消费不足。收入差距过大也将导致宏观经济在产业之间、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出现不良循环。夏若江(2000)指出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作用必须建立在没有超过社会承受能力,没有新市场的出现,以

及没有制约储蓄顺利转化为投资制度缺陷的条件下,否则收入差距会成为导致需求萎缩、经济增长停滞的重要导火索。

2005年前后开始陆续出现实证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采用计量方法检验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影响作用。实证结果普遍验证了收入差距对投资、消费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陆铭等(2005)结合联立方程模型和分布滞后模型,研究了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投资的当期影响和累积影响均为负。控制收入差距有利于经济增长,并反过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从而可能实现平等与增长的良性循环。杨俊等(2005)选取1995—2000年和1998—2003年两个样本区间,将中国20个省份的截面数据与时序数据相结合,对中国居民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杨旭等(2014)通过蒙特卡罗数值模拟,验证了不同的收入差距与总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总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加而递减。具体而言,在基尼系数小于0.4时,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加,总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得非常缓慢;当基尼系数大于等于0.4以后,随着基尼系数的增加,总体消费开始迅速下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国际上将基尼系数的临界值确定为0.4的合理性。

进入21世纪,学者们开始关注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异质性问题。张春安和唐杰(2004)强调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非线性影响,并指出不同表现形式、不同发展水平、不同程度和不同区域的收入不平等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的影响。随后,尹恒等(2005)通过建立数理模型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倒U型”关系。实证研究方面,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使用平滑转移模型,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与实际经济增长存在长期非线性关系,在泰尔指数为0.100处发生机制转移。1978—1991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为正;1992—1999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效应由正向负平滑转换;1999年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产生阻滞作用,且负效应呈逐年增加趋势。刘生龙(2009)首先基于拉姆齐模型,从理论上证明收入不平等对长期经济增长“先促进后阻碍”这一“倒U型”关系的存在。其次根据跨国横截面数据,分别运用OLS和GMM估计方法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基尼系数的合理区间处于0.37~0.40之间。当一国初始收入不平等程度低于最优值时,可以通过提高收入不平等程度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反之,则应通过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来促进经济增长。王立勇等(2013)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计算滚动偏相关系数,分析了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倒U型”轨迹,过低的收入差距和过高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肖威(2020)认为劳动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倒U型”,即劳动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最初会促进经济增长,而当劳动收入差距较大时,劳动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会阻碍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结论与国外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国外研究结果显示低收入阶段,收入不平等会阻碍经济增长,进入高收入阶段收入不平等反而会促进经济增长。相反,中国学者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扩大会促进经济增长,而随着经济发展,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收入差距扩大会阻碍经济增长。通过深入分析可以发现上述结果并不矛盾,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反而激发低收入阶层为了提高收入而增加劳动供给,创业或者经商,因此收入差距扩大促进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与其他国家接轨,表现为收入

差距扩大将会阻碍经济增长。

(三)关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

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贯穿于经济增长文献中。收入不平等可能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影响经济增长。此外,其中一些影响往往很快实现,而另一些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产生。从理论上讲,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有两种机制,一种是纯粹的经济机制,另一种与政治有关。一般来说,根据 Halter 等(2014),纯经济机制通常导致收入不平等从而促进经济增长,而政治机制则通常导致收入不平等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这些不同机制的存在表明,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实际上目前为止关于这些机制及其综合效应仍存在争议。首先,在经济机制中,收入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最流行论点之一是基于个人储蓄率随收入水平上升的标准假设。随着更多的收入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总储蓄率往往会上升,从而导致更高的投资率。收入不平等的加剧倾向于通过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其次,储蓄和消费是一个硬币的两个面,较大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储蓄的同时会抑制消费,因此短期内也会抑制总需求,国内文献关注较多的影响机制主要是消费渠道。第三,某些类型的投资,特别是创新活动的投资,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创新者通常依赖高收入投资者提供的初始资本,一个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的经济体可能更容易为创新项目提供资金,从而导致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第四,随着收入和财富分配更加集中,对更具创新性的产品的需求将增加,而不是对满足基本需求的商品的需求,这将增加开发新的或更好的产品所需的投资。第五,在信贷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低收入的个人和家庭往往无法对自己的教育和培训进行投资以提高生产率。除了经济机制外,政治进程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向影响。例如,收入差距可能促使低收入者陷入犯罪和其他破坏性活动,这可能破坏财产权的安全和威胁政治稳定,这些社会动荡不利于投资。因此,较低的经济增长将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此外,学者们也提出了其他的影响机制,Ozturk(2016)认为中产阶级的扩大可以使市场多样化,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降低治理成本。

Shin(2012)进一步区分了收入差距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国家所发挥的不同作用。Shin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在发展的成熟阶段,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向的。在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扩大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在发达国家,收入差距会促进经济增长。Shin 分别对比了东亚国家和南美国家、美国和法国。东亚国家的收入差距小于南美国家,经济增长好于南美国家。美国的收入差距大于法国,经济增长好于法国。究其原因,在发达国家,高收入阶层的储蓄率高于低收入阶层,缩小收入差距将会降低整个经济的储蓄率,从而可能导致经济增长的下降。另一个原因是,缩小收入差距可能会降低高收入阶层努力工作的意愿,这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在发展中国家,低收入阶层因受到信贷限制而缺少投资机会,而且收入差距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从而导致经济增长下降。陆万军(2012)总结了收入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机制,认为收入分配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政策、社会稳定、人力资本和经济结构对一国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影响。在比较收入分配对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后,发现收入分配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为严重,收入分配问题很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人力资本积累不足、产业结构落后等问题,使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陷入停滞,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从劳动力供给视角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初始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居民无法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制约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劳动力质量影响了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孙巍和夏海利(2022)研究了居民收入差距经由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对经济

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大的收入差距会造成严重的福利损失,对于既定的收入分布,调整居民消费结构将通过需求引致创新机制对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产生影响。王立勇和袁子乾(2021)采用BK滤波和GMM等方法研究了收入差距对财政政策周期性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收入差距越大,财政政策波动性越明显,而且财政政策波动性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理论上收入差距在不同的机制下对经济增长有不同方向的影响效果,因此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并不明确。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上的模糊性确实符合实证结果,因为实证结果往往由于数据、模型的不同出现相反的结论。

(四) 实证研究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数据与方法

关于收入不平等的度量方法,最常用的是基尼系数,我们统计了四十余篇国外文献,90%以上的文献使用基尼系数,例如Barro(2000)。此外方差、变异系数、阿特金森指数(Atkinson's Index)、道尔顿指数(Dalton's Index)、泰尔指数(Theil's Index)等反映数据离散程度的指标也用来度量收入不平等。也有学者使用中等收入或高收入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度量收入差距,例如Ozturk(2016)。

早期研究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所使用的数据以国家间截面数据为主。例如,Alesina和Perotti(1996)、Persson和Tabellini(1994)、Perotti(1993)。针对截面数据使用的模型一般是普通的回归模型,得到的结论也比较单一,绝大多数学者得出收入不平等抑制经济增长的结论。Neves等(2016)指出,在使用横截面数据时往往得出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负向影响的结果。Deininger和Squire(1996)整理出一个适用于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库,使面板计量模型得以广泛应用。他们还提出用于研究收入不平等的数据库应满足以下条件:既包括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也能够反映整个国家的情况,收入应包含各种来源的收入。

Barro(2000)的研究之后,学者们热衷于研究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在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之间的不同表现,这个阶段所用的数据大多是国家间面板数据,使用的模型是面板回归模型。建立模型时,将样本按照收入水平人为地分为两组、或者按时间人为地分为两组,每一组分别建立回归模型,结论大多验证了Barro的结论。不足之处是,分组是人为的,没有使用断点回归或门限回归,不是让数据说话。Brida等(2020)改进了分组的方法,首先使用聚类分析将38个国家和地区分为四个组,分别是低收入差距-低增长、低收入差距-高增长、高收入差距-低增长、高收入差距-高增长。然后对每个组分别使用误差修正模型研究收入差距的短期和长期影响。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是采用国家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往往忽略了国家间的异质性。近十年来,各国学者更加重视国家的异质性,开始尝试建立模型同时分析各个国家间的普遍规律与每个国家的单独特征。例如Yang和Greaney(2017)基于不平等-增长-再分配关系,建立了一个具有共同因素的误差修正模型(ECM),然后为每个国家构建一个包含国家特定决定因素的ECM模型,以检验每个国家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Kang(2015)以及Bahmani-Oskooee等(2008)使用时间序列方法研究了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也有学者研究单个国家的问题,Ortega-Díaz(2006)则使用了墨西哥32个州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墨西哥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控制变量的选取方面,从已有研究还可以发现,收入差距以外的其他控制变量的选取也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人力资本、贸易开放和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往往会促进经济增长,而生育率则会降低人均增长,但这些解释变量并没有在所有研究中得到一致的应用。

国内学者研究中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普遍采用的数据有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

据和面板数据,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为基尼系数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截面数据的估计方法主要为 OLS 估计,时间序列数据采用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早期的面板数据估计方法主要为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例如杨俊等(2005),后转变为能够减小内生性问题影响的 GMM 方法,例如刘生龙(2007)以及陈工等(2011)。也有使用面板协整技术研究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如陈安平(2009)。为了减小单方程模型中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一些研究采用了联立方程模型,如陆铭等(2005)以及钞小静和沈坤荣(2014)。

国内关于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非线性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了平滑转换模型和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及在时间序列模型或面板数据模型中引入不平等与增长交互项,如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饶晓辉和廖进球(2009)采用平滑转换回归方法,王立勇等(2013)基于1985—2008年28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模型以及计算滚动偏相关系数进行研究。也有学者通过在面板模型中引入收入不平等二次项来确定转折点,如刘生龙(2009)和廖信林等(2012)。李子联(2015)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中间变量,基于1978—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在VAR模型中引入了收入不平等二次项和收入不平等与农村劳动力转移交互项,通过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五) 政策研究

学者们一致认同政府可以通过分配政策调整收入差距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对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Kharas 和 Gertz(2010)指出,1960—1980年代巴西与韩国年均增长率相似,为平均5.6%左右。但是,巴西中等收入群体只有29%,而韩国采取了正确的分配政策,中产阶级比例远高于巴西,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Ozturk(2016)指出中产阶级提供了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关键因素,即消费需求和劳动力供给,特别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力供给。日本、韩国的增长现实显示,通过收入分配政策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是从低收入阶段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高收入国家,Kennedy 等(2017)指出澳大利亚拥有强大的再分配政策体系,通过税收使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者的转移数量远高于其他OECD国家。作为发达国家,澳大利亚较低的收入差距阻碍了经济增长。

学者们也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下分配政策的不同效果。Shin(2012)通过建立数理模型得出,在低收入阶段高税收无法降低收入差距,而在高收入阶段高税收可以降低收入差距。也就是说,在低收入阶段低税收与高增长可以同时实现,而在高收入阶段二者无法同时实现。Persson 和 Tabellini(1994)研究发现如果政府通过累进所得税制调节初次分配,高收入群体工作积极性将下降并阻碍经济增长。可见通过初次分配调节还是二次分配调节效果不同,需要进一步比较研究。Ostry 等(2014)认为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政府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收入分配,并通过改变收入不平等程度影响经济增长。再分配可能会加速经济增长,前提是减少税收漏洞或增加生产性政府支出。龚六堂(2020)认为要积极探索出台针对收入不平等在代际之间传递的税收,如遗产税和财产税等。

(六) 不平等的多种表现形式

以往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收入不平等,实际上不平等有多种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资产不平等与人力资本不平等、农村不平等与城市不平等、努力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不同表现形式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可能不同。张春安和唐杰(2004)采用跨国数据,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主要对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这种作用在短期内的表现最为明显;财富不平等主要对经济增长起负面作用,人力资本作为财富的一种形式,其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也起负面作

用;收入不平等本身对经济增长起正面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正面作用会越来越小,甚至转化为较弱的负面作用,而这种转化可能是由于收入不平等逐渐转化为财富不平等造成的。龙翠红和洪银兴(2010)基于2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农村不平等、城市不平等以及城乡间不平等,发现农村不平等和城乡间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城市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雷欣等(2017)基于2003—2013年的CGSS微观数据,区分了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的差异,发现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但努力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石大千(2018)基于2003—2013年CGSS数据库,将收入不平等分解为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发现机会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作用,努力不平等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的净效应与经济增长表现为“倒U型”关系。

三、对研究现状的评述

(一)关于转折点的研究要考虑各国的国情与新的经济增长方式

Barro根据1960—1990年的数据,实证研究得到2 070美元的转折点,发达国家收入差距阻碍经济增长的实证结果大多来自20世纪60—80年代的数据,1980年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只有1万美元左右,随着四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门限值必然发生了变化。同时,上述估计结果是国家间的平均值,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个国家的转折点和平均值的差距可能相当大。中等收入阶段与低收入阶段不同,中等偏上收入阶段与中低收入阶段也不同。另外,已有的回归分析用的是国家截面数据,估计结果是国家间的平均值,反映了普遍的一般性的规律。对于处在相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受文化传统、社会稳定性、储蓄习惯、消费习惯、家庭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政府政策等因素影响,也表现出“国家异质性”,因此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临界值必然不同。此外,当前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普及以及数字经济、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进步的出现,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此各国是否仍然存在转折点?如果存在转折点,转折点的人均GDP水平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

(二)缺少针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正在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国家的研究

2021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80 976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 551美元。Barro等学者的研究对象是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并未单独针对中国这类正在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迈进,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开展研究。因此,Barro的研究结果不一定适用于中国。中国的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然表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规律,是否也像其他国家那样存在转折点需要进行研究,即使存在转折点,转折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必然与其他国家不同。

(三)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丰富

从研究方法来看,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已有研究大都使用普通回归模型或门限回归模型,也有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用回归模型研究收入差距和经济增长存在两点不足,一是无法刻画时间上的变化规律。从微观机制角度看,同一个体处于不同时期以及同一时期的不同个体具有异质性的消费、劳动力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使经济行为更为复杂,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效果不同。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满足“动态性”和“非线性”的特点,尽管门限回归模型可以确定转折点,平滑转换模型可以刻画渐变性,但是,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而变化的,不一定是突变的,门限回归无法捕捉系数的渐变性;而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参数变化是线性的,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

长的程度可能是加速或减速变化的。二是无法刻画时间上的滞后性,如教育要若干年后效果才能显示出来,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滞后期很长,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滞后;而通过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很短甚至不存在滞后期。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不同路径的滞后期的不同,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应加以区分。由于各个国家的情况千差万别,每个国家的转折点和平均值的差距可能相当大。因此,只有使用单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动态时间序列模型,才能解决上述问题。

(四) 影响机制的研究不够全面

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方面,有许多理论可以用来评估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在于,这些理论提出的各种影响路径往往具有相反的效果,因此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并不明确。遗憾的是,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已有实证研究成果仅仅研究了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效果,或者是通过某些路径的影响,而缺少对一些重要路径的研究,比如通过社会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缺少收入不平等如何通过各种路径影响经济增长的综合研究,具体包括各个路径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和影响时滞。

(五) 国内区域异质性尚未得到应有重视

中国国土面积广大,区域发展不平衡,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基于国家平均水平制定收入分配政策,可能会不利于某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和省份基尼系数,我国经济发达省份与经济欠发达省份收入水平差异较大,2021年北京和上海人均GDP已超过17万元,江苏、浙江、福建人均GDP超过11万元,甘肃和贵州人均GDP不足5万元,不及北京和上海的三分之一。不同区域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北京和上海基尼系数小于0.3,2011—2022年平均经济增长率在8.0%~9.5%之间,东部沿海地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平均经济增长率在9.2%~10%之间,贵州基尼系数高达0.48,平均经济增长率也高达11.7%。因此,不同省份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必然有不同的规律,分析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不能以全国平均水平概括全部,必须考虑各个省份的异质性。

(六) 政策传导与政策效果有待深入研究

在政策研究方面,已有的研究结论各不相同,究竟是扩大收入差距还是缩小收入差距,通过初次分配调节还是二次分配调节,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而且,财政支出的项目不同,政策效果也有所不同。Desdoigts和Jaramillo(2020)指出,再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取决于政府支出的形式和税收的来源。如果政府将税收用于发放给低收入者,则短期内可以促进消费;如果政府将税收投入到公共教育,那么长期经济增长将通过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而增加。因此,在中国制定什么样的政策,需要通过实证研究和政策模拟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政策选择。

四、研究展望

根据已有的研究进展,本文认为如下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一是结合中国国情确定转折点。国内已有文献研究了改革开放初期到实现中等收入这一阶段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转折点,缺少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这一阶段转折点的研究,特别是结合中国的文化传统、社会稳定性、储蓄习惯、消费习惯、家庭和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政府政策、互联网的深度普及、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等,检验转折点是否已出现或预测转折点何时出现。

二是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综合机制研究。需要关注不同机制的动态性和时间滞后性,收入差距通过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滞后期很长,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时间滞后,而通过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滞后期很短甚至不存在滞后期。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不同路径的滞后期不同,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应加以区分。需要特别关注收入不平等通过影响社会稳定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可能激化不同群体间的矛盾,引发低收入群体心理失衡,强化“相对剥夺”,进而导致不同群体间的矛盾,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也会引发不同区域、行业、城乡和社会群体的对立和冲突,影响社会治安。如巴西贫富不均严重,社会矛盾较大,恶性事件频发,它是全球枪击谋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仅2016年就有4.2万人死于枪击案件。^①

三是中国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区域异质性。可以按照低增长-高不平等、高增长-高不平等、高增长-低不平等和低增长-低不平等四种状态进行分组,研究不同状态省份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四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研究。政府部门需关注初次分配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增值税向所得税转变的增长效应和福利效应。在政策研究的方法上,宏观经济模型只能从总量上反映政策效果,无法将微观个体受到的影响加总。政府部门在有关政策实施之前要预先了解政策实施之后对不同特征微观个体的影响程度,以及政府的财政负担是多少,再根据微观效果分析宏观经济效果,由此分析和评价有关政策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为了探究宏观政策的微观基础,可以考虑运用微观分析模拟模型(Microanalytic Simulation Models)。

参考文献:

1. 钞小静、沈坤荣,2014:《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6期。
2. 陈安平,2009:《收入差距、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面板协整研究》,《经济评论》第1期。
3. 陈工、陈伟明、陈习定,2011:《收入不平等、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证据》,《财贸经济》第2期。
4. 龚六堂,2020:《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若干政策建议》,《国家治理》第46期。
5. 雷欣、程可、陈继勇,2017:《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再检验》,《世界经济》第3期。
6. 李实、赵人伟、张平,1998:《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经济研究》第4期。
7. 李子联,2015:《差距、转移与增长:中国的故事》,《财贸研究》第4期。
8. 廖信林、王立勇、陈娜,2012:《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吗——来自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据》,《财贸经济》第9期。
9. 刘生龙,2007:《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经济科学》第3期。
10. 刘生龙,2009:《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影响:理论和实证》,《财经研究》第2期。
11. 龙翠红、洪银兴,2010:《收入不平等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当代财经》第6期。
12. 陆铭、陈钊、万广华,2005:《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经济研究》第12期。
13. 陆万军,2012:《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与传导机制》,《经济学家》第5期。
14. 饶晓辉、廖进球,2009:《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基于STR模型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第3期。
15. 石大千,2018:《收入不平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双边效应——机会不平等和努力不平等的不同作用》,《财贸经济》第8期。
16. 孙巍、夏海利,2022:《收入分布、需求引致创新与经济增长》,《经济评论》第4期。
17. 王立勇、万东旭、杨雨婷、曹庆明,2013:《我国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动态影响的经验研究——“U型”与“倒U型”特征的刻画》,《当代财经》第3期。
18. 王立勇、袁子乾,2021:《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财政政策波动性视角》,《宏观经济研究》第2期。

^①数据来源:《巴西成为全球因枪支死亡人数最多国家》,巴西华人网,2021年9月3日(https://www.brasilcn.com/article/article_19001.html)。

- 19.王少平、欧阳志刚,2008:《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对实际经济增长的阈值效应》,《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20.夏若江,2000:《从收入分配看我国经济增长》,《经济评论》第4期。
- 21.肖威,2020:《经济转型背景下劳动收入差距和资本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第8期。
- 22.杨俊、张宗益、李晓羽,2005:《收入分配、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1995-2003)》,《经济科学》第5期。
- 23.杨旭、郝翌、于戴圣,2014:《收入差异对总体消费的影响——一个数值模拟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3期。
- 24.尹恒、龚六堂、邹恒甫,2005:《收入分配不平等与经济增长:回到库兹涅茨假说》,《经济研究》第4期。
- 25.张春安、唐杰,2004:《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第6期。
- 26.朱新武、阮大伟,1999:《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突出障碍》,《统计研究》第10期。
- 27.Alesina, A., and D. Rodrik. 1994. "Distributive Politics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 (2): 465-490.
- 28.Alesina, A., and R. Perotti. 1996. "Income Distribution,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Investmen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0 (6): 1203-1228.
- 29.Bahmani-Oskooee, M., S. W. Hegerty, and H. Wilmeth. 2008. "Short-Run and Long-Run Determinants of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16 Countries." *Journal of Post Keynesian Economics* 30(3): 463-484.
- 30.Barro, R. J. 200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1): 5-32.
- 31.Binatli, A. O. 2012.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Economic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NO. 569890, DOI: 10.1155/2012/56989. <https://www.hindawi.com/journals/ecri/2012/569890/>.
- 32.Brida, J. G., E. Carrera, and V. Segarra. 2020. "Clustering and Regime Dynamic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52(C): 99-108.
- 33.Cai, F. 2012a. "The Coming Demographic Impact on China's Growth: The Age Factor in the Middle-Income Trap." *Asian Economic Papers* 11(1): 95-111.
- 34.Cai, F. 2012b. "Is There a Middle-Income Trap? Theories, Experiences and Relevance to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 49-61.
- 35.Castelló, A. 2010. "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dvanced Economie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 8(3): 293-321.
- 36.Clarke, G. R. G., 1992. "More Evidence on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1064, The World Bank.
- 37.Deininger, K., and L. Squire. 1996. "A New Dataset Measuring Income Inequalit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0 (3): 565-591.
- 38.Deininger, K., and L. Squire. 1998. "New Ways of Looking at Old Issues: Inequality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57(2): 259-287.
- 39.Desdoigts, A., and F. Jaramillo. 2020. "Bounded Learning by Doing, Inequality, and Multi-Sector Growth: A Middle-Class Perspective."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36(April): 198-219.
- 40.Forbes, K. 2000. "A Reassessment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4): 869-886.
- 41.Gill, I. S., H. J. Kharas, and D. Bhattasali. 2007.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The World Bank Group, No. 399860, December.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6798/429860REPLACEMENT1601OFFICALOUSE0ONLY1.pdf?sequence=1>.
- 42.Halter, D., M. Oechslin, and J. Zweimuller. 2014. "Inequality and Growth: The Neglected Time Dimen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1): 81-104.
- 43.Kang, J. W. 2015. "Interrelation between Growth and Inequality." Asian Development Bank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No.7394, eSocialSciences.
- 44.Kennedy, T., R. Smyth, A. Valadkhani, and G. Chen. 2017. "Does Income Inequality Hinder Economic Growth? New Evidence Using Australian Taxation Statistics." *Economic Modelling* 65(September): 119-128.
- 45.Khalifa, S., and S. El Hag. 2010. "Income Disparities,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as a Threshold."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35(2): 23-36.
- 46.Kharas, H., and G. Gertz. 2010. *The New Global Middle Class: A Cross-Over from West to East China's Emerging Middle 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47.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1): 1-28.
- 48.Li, H., and H. Zou. 1998. "Income Inequality Is not Harmful for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 (3): 318-334.
- 49.Neves, P. C., Ó.Afonso, and S. T. Silva. 2016. "A Meta-Analytic Assessment of the Effects of Inequality on

- Growth.” *World Development* 78(February): 386–400.
50. Ortega-Díaz, A. 2006. “Assess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 Panel Data Analysis of the 32 Federal Entities of Mexico, 1960–2002.” In *Part of Volume: Panel Data Econometric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Empirical Applications*. Edited by B.H. Baltagi, 361–381. DOI: 10.1016/S0573-8555(06)74015-9. Elsevier.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573855506740159>.
51. Ostry, J., A. Berg, and C. Tsangarides. 2014. “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 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No. 14/02; IMF.
52. Ozturk, A. 2016. “Examining th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iddle-Income Tra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Middle Clas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5(3): 726–738.
53. Perotti, R. 1993. “Political Equilibrium,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Growth.”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0(4): 755–776.
54. Persson, T., and G. Tabellini. 1994.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3): 600–621.
55. Shin, I. 2012. “Income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Modeling* 29(5): 2049–2057.
56. Voitchovsky, S. 2005. “Does the Profile of Economic Inequality Matter for Economic Growth?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 Effects of Inequality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0(3): 273–296.
57. Wahiba, N. F., and M. E. Weriemmi. 20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4(1): 135–143.
58. Yang, Y., and T. M. Greaney. 2017.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Japan, South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48(C): 6–22.

A Review of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Economic Growth

Zhao Xindong¹ and Shen Chengfang²

(1: School of Statistics, Huaqiao University;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Huaqiao University)

Abstract: Firstly,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foreign and China’s research progress and research frontiers on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time line. It is found that early foreign scholars focused on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rowth on income disparity, and the hindering effect of income disparity on economic growth began to be emphasized by foreign scholars in the early 1990s.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century, the focus of foreign research turned to distinguish the opposite performance of income disparity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between low-income countries and high-income countries. The early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e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mainly focu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Kuznets’ inverted U-shaped hypothesis to China. With the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income inequality, scholars not only pay attention to the causes of income inequality, but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The focus of research has shifted from how economic growth leads to income inequality to how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s economic growth. Around 2005, relevant empirical research literature began to appear, mainly using econometric methods to test the linear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21st century, domestic scholars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heterogeneity of income inequality affecting economic growth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mpact mechanism, data set, methods and policies. Finally, under the consideration of China’s economic reality, it puts forward possible research directions and research space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come Inequality, Economic Growth, Middle Income Trap, Distribution Policy

JEL Classification: E64

(责任编辑:彭爽)